

扎根中国大地 特殊教育中国化的回顾与前瞻*

高宇翔 买合甫来提·坎吉

[摘要] 特殊教育中国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实现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扎根中国大地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其发展进程和方向,基于对文献的分析,将特殊教育中国化分为前学科时期的文化奠基(1840年以前)、西方特殊教育经验的中国化(1840—1910年)、特殊教育学的中国化创建(1911—1948年)、特殊教育学的社会主义重构(1949—1977年)、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初现(1978—2016年)以及新时代(2017年以来)六个演进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特殊教育并非一种全然的“舶来品”,而是深植于中国土壤、始终依靠中国主体性,交融中外理论与实践而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 中国化 特殊教育学 特殊教育史 中国特色

[作者简介] 高宇翔,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特殊教育史、董校课程与教学(乌鲁木齐 830017);买合甫来提·坎吉,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乌鲁木齐 830017)

DOI:10.13694/j.cnki.ddjylt.20200211.006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大力倡导的“坚定文化自信”以及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为当代教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教育学较早成熟于西方^[1],对其中国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实现教育实践与理论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必要路径。作为教育学分支的特殊教育学亦肇始于西方,是一门研究感官缺陷、心智障碍、智能超常等有特殊需要学生的普遍教育规律、原则和方法的科学^[2]。基于历史视角,申仁洪从古代、近代和当代回溯了中国特殊教育工作的变迁^[3],雷江华以1978年为界将中国特殊教育学科的成长分为萌芽起步和发展深化两个时期^[4],冯元、俞海宝分析了新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演进^[5],李尚卫则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讨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特殊儿童义务教育的发展阶段^[6]。

上述研究还未充分体现对特殊教育中国化

的含义、进程和规律的关照。参考教育学中国化的概念,特殊教育学的中国化可界定为:在中国本土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从国外引进的特殊教育学进行改造,使之发展与中国的联系,进而符合中国特殊教育工作的需要、指导中国特殊教育实践的过程^{[7][8][9]}。特殊教育学是如何在中国扎根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历程,其发展走向如何?本研究期待通过进一步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探讨特殊教育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从而更好地理解以上疑问。

一、1840年以前 前学科时期的文化奠基

中国特殊教育思想和早期实践孕育于原始社会,萌生于封建时期,为后来引进国外特殊教育学并使其中国化提供了得以扎根的文化沃土。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殊教育通史”(编号:17ZDA321)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编号:AOA180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方面,中国素有仁爱宽厚、扶助贫弱的文化传统。《礼记·礼运》主张“天下为公”,保障残疾人的生存权;《论语·子罕》记载孔子遇到盲人“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荀子·王制》提出有身体缺陷的人“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这些观点体现的就是古人对基本社会正义和仁义道德的思考,表达了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关怀,以及兼容并蓄、关注差异、因势利导的实践指针。

另一方面,中国尝试了早期的特殊教育实践探索。商周时期盲人就能在“瞽宗”接受教育,这被认为是国际特殊教育实践的创举^[10]。孔子践行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倡导教育对象应有包容性,教育内容应有灵活性。超常儿童的教育在封建社会更受推崇,家庭和学塾培养出的拥有智慧计谋、擅长诗赋属文、谙熟道德礼仪的“神童”有更多机会通过考选被政府任用,成为国家社稷之栋梁^{[11][12]}。但是,彼时中国零星开展的特殊教育大多架构在迷信而非科学的基础之上。春秋战国后期,统治阶层礼崩乐坏,盲人教育便衰落下来,其他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情况亦甚为少见^[13],他们被认为是遭因果报应所致^[14],常遭误解和偏见,人们相信其“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15]。对残疾人的认知偏误与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之间的碰撞,生发了“养而不教”的工作形态,这种重“养疾”而轻“教化”的迷思,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禁锢了残疾人社会融入和特殊教育勃兴,使中国封建社会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和特殊学校”^[16],特殊教育长期处于前学科时期,缺乏“理论上的自觉”^[15],其范畴没有被划分,也没有形成专门研究和著作。

二、1840—1910年西方特殊教育经验的中国化

特殊教育中国化在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西方特殊教育实践经验和理论传入中国,外国传教士成为在华兴建特殊学校、推动特殊儿童教学法中国化的主导者,中国特殊教育的主体性开始觉醒。

18世纪中叶,世界第一所聋人学校、智力落后学校和盲人学校相继在法国成立,其实践成果

证实残疾人教育是可行的。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打开国门学习国外先进文化和技术,特殊教育经验随之涌入^[16]。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卷下》中介绍,特殊学校中聋、盲学生分别采用“手调音”和“凸字书”作为学习工具,是国人对西方特殊教育经验的较早学习。

外国先进文化的冲击催生出国人兴办特殊教育的省思,然而希冀在国内全然“照搬”西方特殊教育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1859年,洪仁玕借鉴西方经验,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创建特殊学校的首个方案“兴跛盲聋哑院”,但由于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完全推倒”^[17],特殊教育文化根基被倾覆。于是,人们又将“留美幼童”视为归国办校的“合适人选”^[18],他们生活在美国聋人学校发源地——哈特福德,接受过特殊教育思想熏陶,但受多方条件制约,这种期待也未能如愿。

外国传教士主持了特殊儿童教学法中国化的最初过程。国内早期的数十所特殊学校主要由传教士创建,他们将先进的西方特殊教育经验直接应用于中国实践,将盲、聋儿童的收容和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并逐步根据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教学法的调整与改良,这在特殊教育中国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突出成果有基于北方官话的瞽叟通文和盲人教学法、基于鲁东方言的聋人手指语和口语教学法等。记录上述成就的著述《中国盲字的发明人》(1898)和《启哑初阶》(1907)分别以传记和教材形式出版。

到19世纪末,特殊教育在国外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19]。1903年,日本小泉又一的《教育学教科书》被译成中文,这是首部包含特殊教育专门章节的教育学译著。特殊教育经验和理论的传入,使中国特殊教育在萌芽阶段就紧跟国际步伐,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彼时政府与民间力量鲜少参与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思想多是“舶来”的,限于经费与师资,传教士主导的特殊教育工作进展缓慢,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传教意图,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侵略和渗透”^[16],他们往往将盲、聋儿童培养成宗教宣传的得力工具,以便吸引“不信主的人耐心坐下来接受上帝打动”^[20]。

面对“舶来”的特殊教育学,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分歧。因循守旧的“顽固”人士将其视为一种“妖孽”和“骗人的把戏”加以打压^[21],主张重民权、兴西学的“改良”者则赞同特殊教育对中国社会之价值,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学校》(1894)中提出的“特殊教育要帮助残疾人掌握职业技能从而‘自养其天刑之躯’”,康有为在其《大同书》(1902)中提出的“要为盲、聋人士设‘特别之院’,传授文化知识和劳动技术,使他们不仅有能力‘营生’,还能创造幸福生活,‘快然生事之乐而无憾’”。这些对特殊教育目的的中国化表述,显示了中国特殊教育主体性的觉醒。

三、1911—1948年 特殊教育学的中国化创建

外国传教士不仅广泛参与了中国特殊教育实践,还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本土的特殊教育师资。在此过程中,中外特殊教育工作者深度合作,推动中国特殊儿童教学论日臻完善,代表作品有:傅兰雅的《教育警人理论》(1911)、傅步兰的《盲童教育论》(1913)、华林一的《低能教育》(1929)、陈德征的《天才儿童教育》(1931)、杜文昌的《聋哑习音教授法》(1936)等,其中《教育警人理论》是“现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一本系统阐述盲教育的专著”^[22],堪为中国特殊儿童教学论的开山之作。

特殊教育学得以在中国创建,离不开民国政府对特殊教育的介入。《学校系统令》(1912)和《教育部官制》(1914)等政令、规章描画了特殊教育的蓝图,标志着中国化的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开始构建。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教育救国”成为当时“风行的一股潮流”^[23],中外力量在教育领域碰撞、角力,引发了19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国人接替传教士成为特殊教育中国化的主人翁,国外力量和宗教因素逐渐从特殊教育领域中剥离出来。

新的特殊教育形态迫切需要新的特殊教育理论提供指导。最初,中国学者主要是在编纂教育学著作的过程中介绍特殊教育理论的,例如:刘以钟编写的《新制教育学》(1914)是较早阐述特殊教育

的中文教育学著作,张毓骢的《教育学》(1915)、王凤岐的《教育学》(1916)等亦有“特殊教育”的单独章节。通过理论的逐步积累,中国学者参考国外资料编写出一批特殊教育专门著作,其中周维城《特别教育》(1915)介绍了特殊教育的对象以及不同类型特殊儿童的测量、评估与教学方法,是目前所知第一本中国化的特殊教育学著作,是中国特殊教育学迈向独立学科的标志。

随着邵爽秋的《特殊教育之实施》(1924)和华林一的《残废教育》(1929)等书的相继出版,散见于各类教育论著中的特殊教育内容得到整理。1937年李万育编著的《特殊学校》详细论述了中国聋哑、盲目、低能三类学校的历史沿革,组织设备和课程教学,达到当时特殊教育学著作的较高水准,为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化特殊教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式。

基于上述努力,中国特殊教育学的性质和对象得到初步确认,“即特殊儿童教育之意,相对于通常教育”;身心特征与一般儿童有明显差别、要求教育者对其教学材料和教育期待另行设定一个标准的,就称为特殊儿童;狭义特殊教育包含盲、聋哑、低能三类,广义则包含聋哑、病弱、犯罪、孤残、怠惰、天才、痴愚、口吃、癫痫、疯狂儿童的教育甚至妇女教育^{[24][25]}。特殊教育目的也有了中国化的表达,即以“实现全民教育”为宗旨,培养特殊儿童“修养为个人的人格、为国民的资格”并通过“职业的练习……取得一个职业而自立”从而“变残疾为专材,贡献国家”,成为“抗战建国的建设人才”^{[24][25]}。

特殊教育研究渐入正轨是该时期中国特殊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另一成果。孙振的《教育学讲义》(1929)将“知能之差异及其测定方法”引进国内,为智力落后儿童的鉴别创造了条件,李仲珩的《统计研究法》(1933)较早系统地介绍了“聋哑、盲、白痴的统计学研究方法”;李任仁译的《教育病理学》(1933)和吴绍熙等译的《教育心理学》(1939)为特殊教育学中国化提供了病理学和心理学基础。同时,江苏南通盲哑学校于1928年牵头组织中华盲哑教育社,“以研究盲哑教育,并促

进其发展为宗旨”^[24]，从此中国拥有了首个特殊教育研究机构。

从以上特征看，1911—1948年特殊教育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态。不过，特殊教育的称呼尚未统一、对象甚为宽泛，尚不完全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特殊教育学的结构模式和话语系统仍以照搬国外资料为主，“中国化”囿于现状描述、经验介绍的初始阶段，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存有隔阂，自上而下的理论言说者大多从未接触过特殊教育实践，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员也基本没有进行过自下而上的教育研究和理论思索，虽然出现了研究机构，但其存续时间相对短暂，撰写和发表的主要是调查报告，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四、1949—1977年 特殊教育学的社会主义重构

20世纪50年代初期，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特殊教育融入中国教育体系，随后教育部新设“盲聋哑教育处”，着手接管各类民办特殊学校，又在部分省市新建了一批公办特殊学校，为特殊教育学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实践滋养。政府的支持激发了学术界对特殊教育学的深入关心，在从欧、美、日转向苏联学习，改造旧教育学，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过程中，特殊教育学几乎中断了与1949年前的联系，进入了崭新的中国化发展轨道。

1950—1960年之间，基于社会主义思想重新阐述的特殊教育学达到了阶段性的发展高峰。《怎样改造特殊儿童》（1950）、《小学特殊儿童的教育》（1951）、《谈天才》（1957）等著作结合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提出“特殊儿童的教育目的，应是为集体教育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个别儿童发展个性”^[25]，“天才只是劳动的积累……社会主义是培养天才的温床”^[26]的论断。师从陈鹤琴的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教员姚尧庚将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在《特殊儿童教育》（1952）中系统阐述了“教师是思想意识的工程师、在教学中应起主导作用”，注意“培养出更多、更好、更快的特殊儿童”，“使儿童趋向正常”，“迅速谋求技能为建设新社会

创造条件”等，是当时融通社会主义思想与特殊教育实践、实现特殊教育学中国化的集大成著作。

一批苏联特殊教育学经典图书也被引入国内。1956年《聋哑学校的课堂教学》以中文出版，其“必须考虑一切聋哑儿童的共同特点，同时必须保证要用个别对待的办法来对待每一个儿童”^[27]的核心观点至今仍在中国特殊教育中发挥影响。1958年《在认识与劳动活动过程中盲缺陷的补偿途径》和《智力落后儿童认识活动的特点》论说了“任何东西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一切都是随时可以达到的”，以及“创造合理的条件和应用必要的教学和教育方法，不仅能够使学生纯熟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形成各种被破坏技能的补偿途径和方法”^[28]。

1956年朴永馨、银春铭由国家选派前往苏联专攻缺陷学，他们在校期间全面学习了盲、聋、智力落后教育的理论与技术，回国后长期从事一线特殊教育工作者，为日后二人成为特殊教育学中国化的引路人打下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零星的欧、美、日特殊教育思想流入国内，其中日本学者三木安正的《特殊教育学》（1964）^[29]是目前所知“特殊教育学”这一中文词汇的发端。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从宽泛转向对盲、聋、智力落后三类儿童的聚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选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为“缺陷补偿”“教育改造”等中国化的特殊教育思想确立了理论来源。然而在主流观念的影响下，一些超越客观的言说也一定程度地干扰了特殊教育学的中国化。1967—1976年，“破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席卷内地，教育学被判为“伪科学”^[30]，特殊教育学则试图完全脱离国外指导“另起炉灶”。为了“改造”特殊儿童、补偿其生理缺陷，“医学模式”大行其道，部队医疗工作者普遍进驻特殊学校，将特殊儿童病理学和传统医学相结合，总结出“打开聋哑禁区”“使盲童喜见红太阳”的“医教合一”模式，形成的论著以多国文字出版，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宣传的重要内容。

五、1978—2016年 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初现

1978年党确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82年《宪法》规定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特殊教育责任,加之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1992)的推动,“特殊教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1980年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会筹备组成立、1988年全国召开了第一次特殊教育工作会,特殊教育学中国化踏上新征程。不过,彼时中国内地残疾儿童总入学率还不足6%^[31],特殊教育落后面貌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想之间的矛盾,使恢复和发展特殊教育研究、探索普及特殊教育路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成为这一阶段特殊教育学中国化的主要线索。

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学著作趋于丰富,推动了学科体系的发展。从美国的《特殊儿童的心理与教育》(1989)、日本的《特殊教育的展望》(1996)到俄罗斯的《特殊教育学》(2011),翻译作品博采众长、紧跟国际主流,国内著作以陈健生《特殊儿童的特点和教育》(1986)为始便一发而不可收,仅作为入门教材的“特殊教育学”或“特殊教育概论”就有近20种,国内学者主体性的增强推动了特殊教育学的中国化。以此为契机,各类特殊教育学校普遍建立并形成了各自的中国化学科理论,分别以《盲童教育概论》(1981)、《聋童教育概论》(1985)、《天才儿童的教育》(1991)和《弱智儿童心理与教育》(1992)的出版予以确立。

基于“国际化理念+中国化实践”^[32]学习障碍、孤独症等特殊儿童教学论在国内建立起来,《特殊教育史》和《学前特殊教育》(2000)、《特殊教育学校管理》(2012)等作品相继出版,使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特殊教育学自身也开始分化,拥有了日益庞大的学科集群。

1998年,朴永馨在特殊教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的构想^[33],其2014年出版的《特殊教育学》从特殊教育的一般问题、类型和学段、管理与组织三个维度擘

画了“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的架构。经过中国化的长期积淀,“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意蕴趋于显现:传统的“养而不教”“医教合一”演进为“医教结合”,教育的“改造”发展为“康复”,从片面强调特殊儿童的缺陷补偿转向注重将开发潜能与补偿缺陷结合起来,对学校课程与教学以及特殊儿童毕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班就读思想植根本土经验和西方融合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最主要的实践形式和未来发展的思想基础^[34];实践层面打破隔离走向融合,建立了以“普通学校班就读为主体、特殊学校为骨干、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的特殊儿童安置体系^[35],面向不同学段和类型的教育对象,形成了从学前、义务、高中到高等教育的全方位、多层次办学结构,使特殊儿童的教育、发展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

六、新时代特殊教育学中国化走向的前瞻

纵观特殊教育学中国化,从前学科时期的文化奠基、西方特殊教育经验的中国化和特殊教育学的中国化创建,到特殊教育学的社会主义重构,再到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初现,实质上体现了中国特殊教育学主体性的酝酿、觉醒、实践、反思进而走向强化和解放的历程。

因此,中国的特殊教育学并非一种全然的“舶来品”,而是深植于中国土壤、始终依靠中国主体性,交融中外理论与实践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具体言之,1840年以前特殊教育就已在我国积累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其间形成的“天下为公”“仁者爱人”思想是特殊教育学中国化的支点,是“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的核心^[36],能经受时间的涤荡而保持相对稳定。不仅如此,诸如“养而不教”“有教无类”等经过长期选炼的传统阐述,甚至为当代“医教结合”“随班就读”等“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思想提供了雏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理论期求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碰撞、外国文化与中国国情之间的交流,为特殊教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动能。1840年以前对残

疾者的认知偏误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相碰撞,生发了“养而不教”的残疾人工作形态;1840—1910年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国内顽固人士和改良者的思想分歧,推动了特殊学校的建立和特殊教育思想中国化;1911—1948年“教育救国”热潮和西人在教育界宗教渗透之间的角力,促使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介入特殊教育实践与研究,拉开中国化的特殊教育学步入独立学科殿堂的序幕;1949—1977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碰撞,以及1978—2016年特殊教育的落后面貌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想之间的矛盾,则进一步将中国特色融入特殊教育学,促进了特殊教育学从“中国化”走向“有中国特色”的跃升。

中国化的轨迹勾勒出特殊教育学始终基于中国文化又不断超越中国文化,从懵懂、徘徊走向自省与改革,进而逐步实现“昨日理想——今日现实——明日期待”之间的传承往复。特殊教育学中国化的历程蕴含对立统一、矛盾转化、兼容并蓄的思想,富有中华文化的贤者智慧和哲学思索,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精髓所在。

2017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开局之年,《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公布,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办好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中国化也由此迈向了更高层次。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特殊儿童的教育期待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提高特殊教育质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37]。随着义务教育趋于普及,经济社会区域之间、不同类别特殊儿童之间的教育发展不均衡,学前康复、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供不应求问题凸显,如何从提供条件保障、强化师资队伍、提升教育科研等方面促进特殊教育质量提升,办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特殊教育,为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特殊教育的贡献,将成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是当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路,它要求特殊教育学应当实现“中国化”向“有中国特色”转

变,在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的培养,使广大特殊儿童也能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就当前特殊教育学中国化本身而言,其内涵与体系的建构仍不成熟^[3]，“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尚未实现。如何跳脱出固有思维、超越对西方特殊教育学模式的积极追随,吸引更多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话语系统、形成特殊教育学的中国气派,进而为国际特殊教育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是这一领域在当下与未来值得长期探索的旅程。

参考文献:

- [1]黄奕红.教育学“中国化”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06(1):25.
-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2[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260.
- [3]申仁洪.从隔离到融合:中国特殊教育的历史考察[J].教育史研究,2011(4):2-9 A7.
- [4]雷江华.中国特殊教育学学科论初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132-136.
- [5]冯元,俞海宝.中国特殊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演进与路径依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J].教育学报,2017,13(3):92-101.
- [6]李尚卫.我国义务特殊教育发展战略40年:回顾与展望[J].当代教育论坛,2019(6):1-14.
- [7]陈桂生.略论教育学“中国化”现象[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4(4):1-4,10.
- [8]闫引堂.“教育学中国化”命题之再认[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2):11-14.
- [9]张忠华,贡勋.教育学“中国化”、“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辨析[J].高校教育管理,2015,9(6):46-53.
- [10]肖非等.共享阳光:共和国特殊教育报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15.
- [11]朱宗顺.特殊教育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 A1,201.
- [12]吕智红,唐淑.神童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J].学前教育研究,2001(5):11-13.
- [13]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9.
- [14]陆德阳,日稻森信昭.中国残疾人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28.
- [15]高宇翔,刘艳虹.中国的聋教育:历史与反思[J].教育史研究,2012(4):66-67.

- [16]王培峰.西方特殊教育内涵的历史分析[J].现代教育科学,2011(5):156-160.
- [17][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316.
- [18]The Editor. An Appeal for China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1887(4):133-140.
- [19]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2.
- [20]高宇翔,袁东.中国盲人:对戈登·库明女士宣传聾哑通文的批评[M].台北:华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149.
- [21]高宇翔.无声世界:中国聋人史略[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8:66-67.
- [22]马建强.中国特殊教育史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58.
- [23]张宪文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85.
- [24]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76.
- [25]张文郁.小学特殊教育的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1-3.
- [26]周先庚,郑芳.谈天才[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3-9.
- [27][苏]孜科夫,科尔宋斯卡著,李子卓等译.聋哑学校的课堂教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228-231.
- [28][苏]捷姆佐娃著,孙维等译.在认识与劳动活动过程中盲缺陷的补偿途径[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10.
- [29][日]日本学术会议编.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译.日本文科学现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95-101.
- [30]张忠华.教育学中国化百年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06(6):86-92.
- [31]张玉文.中国特殊教育落后面貌亟待改变[N].中国教育报,1988-11-24.
- [32]肖非,冯超.建设有中国特色特殊教育学科之思考[J].现代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17(6):5-6.
- [33]朴永馨.努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科[J].特殊教育研究,1998(1):2-4.
- [34]张福娟等.特殊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3.
-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8.
- [36]王培峰.特殊教育政策:正义及其局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2.
- [37]杨克瑞.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与战略推进[J].中国教育学刊,2018(5):31-35.

Rooted in China : Review and Prospect on Special Pedagogy Sinicization

Gao Yuxiang & Mahpiret·Kanji

Abstract: Sinicization is not on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ulture,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root in China's land. This study combs the history of special pedagogy Sinicization and divided this process into six development stages: (1) foundation of culture in the pre-disciplinary period before 1840. (2)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thought in 1840-1910. (3) the creation of Sinicization special pedagogy in 1911-1948. (4) discourse restructuring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5) special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1978-2016. (6) Chinese special pedagogy in the New Era since 2017. The present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course of Sinicization of special pedagogy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brewing, awakening, practice, reflection a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liberation of the subject of special education. China's special pedagogy is not a complete Foreign Product, but deeply rooted in the soil of China, always relying on China's subjectivity, and developed by blending Chinese and foreign special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sinicization, special pedagogy, history of special educa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uthors: Gao Yuxiang,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Mahpiret·Kanji,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责任编辑 李 静]